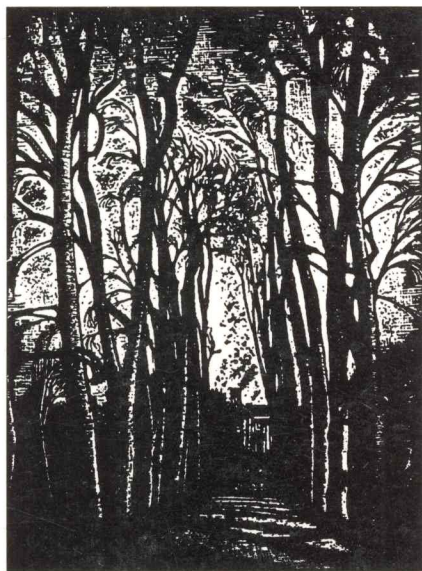


培文书系

叩问美文

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
现代性转型



黄科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70611

I207.65

12

黄科安 著

叩问美文

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
现代性转型



北航

C1678154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07.65

12

11807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黄科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9

(培文书系)

ISBN 978-7-301-23010-7

I. ①叩… II. ①黄…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7252号

书 名: 叩问美文: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

著作责任者: 黄科安 著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010-7/1·266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25印张 362千字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二十年代外国散文译介与现代散文的观念重建	12
第一节 “五四”知识者积极探寻域外散文资源	12
一、现代散文译作的先声	12
二、“五四”时期的白话散文译作	13
第二节 “Essay”的译介与现代散文的观念建构	21
一、“五四”文坛对“Essay”的引入与效应	21
二、思想观念的现代建构：“自我人格”和“批判意识”	29
第二章 三十年代外国散文译介与现代散文的视域拓展	37
第一节 小品散文译作的拓展与深入	37
一、以《骆驼草》、《文艺月刊》、《青年界》等为代表的散文译品	37
二、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为代表的论语派散文译品	41
三、日本随笔的翻译与介绍	45
四、从“Essay”到小品文提倡	53
第二节 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派散文的异军突起	67
一、《现代》杂志与“现代”意味的散文译品	67
二、《西窗集》：西方现代性散文的译介窗口	70
三、《水星》散文作家群与西方现代主义	74

第三节 左翼资源与现代散文新领域之开拓	78
一、左翼知识者与西方报告文学的译介	78
二、科学启蒙与科普作品的输入	88
第三章 四十年代外国散文译介与现代散文的偏至发展	96
第一节 域外文学散文的译介与传播	97
一、“林氏刊物”散文译品的流风余韵	97
二、以《辅仁文苑》、《中国文艺》、《艺文杂志》为代表 的北平散文译品	99
三、散落在国统区、沦陷区杂志的其他文学散文译介	101
第二节 西洋杂志文的兴盛与影响	104
一、林语堂与“西洋杂志文”的倡导	104
二、“西洋杂志文”在战时中国的译介	105
三、“西洋杂志文”理论的引介与评述	110
第三节 苏俄散文译品的崛起与独尊	114
一、左翼知识者是苏俄文学翻译的主体力量	114
二、以《野草》、《中苏文化》等为代表的国统区文化界 对苏俄散文译介	115
三、以《解放日报》等为代表的延安文学界对苏联散文 的译介	120
第四章 现代知识者与外国散文译介之关系	125
第一节 鲁迅：推动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	125
一、建树卓著的散文译介大师	125
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精神资源	127
三、现代杂文：社会改造和思想启蒙之利器	135
第二节 周作人：随笔的现代性转换与创造	151
一、“Essay”译介与现代随笔观念的重建	151
二、“爱智者”批评标尺的重构	161
三、修辞策略的统摄与制衡	173

第三节 梁遇春：中国的“伊利亚”	183
一、解读：勾勒译家心中的英国随笔谱系	185
二、借鉴：建构一种现代的随笔观念	190
三、尝试：创作中国的“伊利亚”文体	200
第四节 朱光潜：中西文化视野与现代散文理论的构建	212
一、由隔至通：文白之争背后的现代语体文建设	212
二、本体追问：诗与散文的界说	221
三、深度识别：重构散文的各类文体形态	226
第五章 现代散文的言说方式与话语实践	239
第一节 现代语体散文的探索与构建	239
一、“文学散文”概念的引入	239
二、西方“Essay”与“闲话风”语体风格的确立	241
三、中国传统资源与现代语体散文的重建	245
第二节 晚明小品与现代小品文理论的建设与探索	251
一、源流的论争：散文学者不同的学术立场	251
二、“闲谈体”小品文理论的建设与探索	260
第三节 艺术散文：从“闲话”走向“独语”	273
一、倡导“艺术散文”的先声	274
二、开拓散文新的书写空间	281
第六章 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现代散文文类之关系	288
第一节 随笔：现代知识者的观念重构	288
一、随笔的诠释与界说	289
二、现代随笔的审美特征	302
第二节 散文诗：诗情与哲理相融合的艺术创造	310
一、散文诗的源起	310
二、独具诗美内涵的文体特性	313
三、散文诗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319

第三节 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 兴盛于战时	325
一、左翼知识者与报告文学	326
二、现代知识者与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	328
第四节 科学小品：现代知识者热心的倡导与实践	337
一、科学小品与大众化教育	339
二、文学性与科学小品	347
第五节 传记文学：由“史”入“文”的现代性转型	357
一、由“史”入“文”：西方传记的现代性	360
二、借鉴与传承：中国传记的现代性构建	374
主要参考文献	385
后 记	394

绪 言

新时期以来,林非、俞元桂、姚春树、余树森、汪文顶、范培松等在中国现代散文研究领域里筚路蓝缕、垦地拓荒,已经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他们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完整地勾勒了中国现代散文史的面貌,梳理研究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基础理论和观念范畴。近年来,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在前辈学人的引导下,积极探讨现代散文研究的一些新路径,或以历史脉络的系统构建,或以作家文本的审美批评,或进行文化的或心态的综合观照……多角度多层次地进入散文研究世界,为散文批评的多重艺术视角和多元文化诠释的确立,各自作出了认真的探索。本人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外国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旨在触及 20 世纪中国知识者翻译和接受域外散文的情形,以及中国散文在西学语境下如何实现现代性转型的问题。因此,本课题是建立在前辈学人清理中国现代散文史概貌的基础上,试图从“译介”这一崭新视角来探讨中国现代散文的基本范式和理论资源。

中国现代散文从一开始就置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背景中,关于这个方面,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朱自清就卓有远见地指出:“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① 30 年代,鲁迅指出“五四”后小品散文的成功,也是得益于“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②。周作人也说:“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③可以说,中国散文是在“外援”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现代性转型,学界在

①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第 7 卷第 20 期,1928 年 11 月 25 日。

②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第 3 卷第 6 期,1933 年 10 月 1 日。

③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年。

这一点上并无疑义。前辈学人虽在现代散文史的整体格局研究中关注到这一问题，并且有的还专门撰写过这一方面的若干或单篇论文，但始终未能系统完整地探讨这一课题。这与该课题的重要性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基于此，本课题的提出，其意义就在于：

其一，站在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译介”视角，系统清理当时译介过来的外国散文作品和散文理论，这不仅要梳理欧美、俄苏、日本诸国度的散文名家、散文样式的译介概貌，而且将注意探讨它们在中国现代译介史中的流变和兴衰。而此项内容的系统研究将是填补中国现代散文译介史上的空白。

其二，站在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译介”视角，探讨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这是从根源上研究中国散文在遭遇西方现代性后，现代知识者如何以现代理性的批判精神和自由言说的先锋姿态，介入现代散文的精神与艺术的建构，从而制造和产生一系列与散文相关的言说方式、审美趣味和创作原则。

其三，站在中国现代知识者的“译介”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各种样式的生成机制和话语类型。诸如现代随笔、散文诗、现代杂文、科学小品、报告文学、传记等。这些文类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知识者倾心译介域外散文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是直接在外来散文品种的诱导下而产生的，并成为中国散文这个文类大家族中重要的新成员。

其四，本课题的开展研究，使学界更加了解散文译介与中国散文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关系，这将有助于更加理性和富有开拓性地选择译介一些外国散文作品和理论话语，进而促使中国现代散文在与各国散文的融合碰撞中，不断赋予新的创造理念，以便中国知识者在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充当知识生产和社会批判的重要言说载体。

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其实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知识者对外国散文作品和散文理论的“译介”；二是中国知识者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外国散文资源，进而完成自身现代性转型。因此，跨文化的“译介”成为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肇始于晚清，晚清的有学之士借助“翻译”之力，打开通往世界的窗口。梁启超

说：“自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①这种引入国外的“报章文体”，成为当时士大夫言说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散文开始现代性转化的雏形。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占领和瓜分，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出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崛起，离不开与现代报刊、出版社和大学等构成的一套知识生产空间的制度形式。尤其是到“五四”以后，中国知识者以“翻译”为中介，积极探寻域外的散文资源，起到为他们提供新理想、新思维、新观念和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用。根据散文译介的演进过程，本课题项目将中国现代散文译介史分为三个阶段，即20年代（“五四”时期）、30年代、40年代（战争时期）。在对该译介谱系的描绘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时期中国译者呈现出不同的兴趣点。“五四”时期，译者侧重选译了西方著名作家如尼采、罗素、斯威夫德、契诃夫，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厨川白村、鹤见祐辅、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等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作家不少本身就是思想家，其散文大多是随笔体（“Essay”）。因此，这一时期译者对西方“Essay”理论与作品的译介，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重要知识资源。到3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知识者政治立场的分化，左翼知识分子侧重提倡杂文、报告文学和科学小品的译介与写作，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提出“小品文”概念，倡导创作英国随笔式的娓语笔调。进入40年代，战争造成特殊的生态环境，打破原先的文学发展格局及其面貌。总体而言，散文译介趋于多元化。在沦陷区上海“林氏刊物”的遗风尚存，“西洋杂志文”进入国人的视野，破除了一般人对通俗杂志文的误解和漠视。左翼知识者对苏俄散文的偏爱，成为本时期译介史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国统区《野草》、《中苏文化》、《苏联文艺》等刊物上出现了左翼知识者掀起对苏俄散文的译介偏好，在解放区则出现以《解放日报》等为代表的延安知识界对苏联散文的译介热潮。

由此看来，“翻译”并不像在人们通常眼中的那样，是从一种语言变

①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卷，中华书局，1989年。

成另一种语言而已。在译介的背后，蕴藏的是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它涉及如何探讨“翻译的政治”这一核心问题。中国知识者通过阅读、译介国外的大量散文，以获取丰富的思想资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启蒙和知识生产提供动力。然而，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知识背景的知识者，他们在对待外国散文的“翻译”上，各有不同的利益和动机，因而也就凸显了“翻译”背后话语控制权问题。周作人在“五四”之初，提倡译介和借鉴西方“美文”，但在20年代中期后，却开始积极倡导回归传统，主张现代散文源流是晚明小品。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学理念的背后，意味着他学术立场发生了重大的位移与转换。林语堂于30年代初，提倡“闲适小品”，号召人们学习英国随笔的“娓语笔调”，这表明了他对“闲适”话语的获取途径，主要源于西方文体的体认和把握上。可以说，“闲适”，经由周作人倡导，再到林语堂的身体力行，成为了贯穿“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话语。它是安静平和，追求优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现，也是边缘的和独立的，隐士式的境界的体验。因此这种“闲适小品”的提倡背后，其实潜伏着“翻译的政治”，即与当时左翼知识者争夺文化话语主导权。而徐志摩、何其芳为了抵抗散文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主张散文独立的艺术制作，其背后凸显他们主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接轨，构成了对“五四”业已形成的谈话风散文传统的抛弃与批判，从而突破已有的现代散文的文类规范，开拓现代散文新的书写空间。到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文坛出现大量译介的通讯报告和苏俄散文，更是受到当时国统区左翼意识形态以及延安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相关。换句话说，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译者的现实考量和价值取舍，而这一点势必影响到外国散文译介的偏至走向。

散文译介对中国散文现代性转型的作用，应该着眼于翻译话语的差异性，即将翻译话语中被遮蔽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充分揭示不同语言之间那种不对等的关系。美籍学者萨义德创造性地提出翻译的“理论旅行”观点，提示了人们通过“理论旅行”看一看，哪些问题遭到排斥、限制和挪用。一句话，“翻译”的政治存在着不对等的关系。这是对人们先前过

分信赖“翻译”的透明度和单义性而提出前所未有的质疑。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着眼于翻译话语的差异性,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注翻译者所采纳什么样的话语方式,“五四”时期,以“任心闲话”为特征的“Essay”,既充分展现代散文家的自我个性,但在艺术上也被一些作家误读,以为创作散文大可以随便,无须艺术的追求与讲究。这也就导致文坛上曾经流行一种所谓“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观点。于是,为了矫正,周作人走上一条寻找现代散文的精神源头的回归之路。他在《〈杂拌儿〉跋》中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①这和他在“五四”初期的一些文学主张的内容大相径庭,仿佛脱胎换骨一般。1926年,他给俞平伯的一封信里谈到:“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②因而,要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周作人提出现代散文语言必须兼容并蓄的观点,认为在“口语”基础上,“杂糅调和”古文、方言和欧化语,从而提高白话语言的表现力,使之“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③。可见,周作人对“传统”的回归,是出自当下创新的需要。德里达说:“返回是创新的历程表中必须经过的一站和一段时间。”^④这说明在解构主义理论中,没有返回就没有真正的超越和突破。因此,周作人对“传统”的回归,并非单纯的复古,事实上,他是为突破白话语体文创作困境,寻找一个可以不断汲取能量的精神资源。

其次,翻译散文的“理论旅行”,又为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所制约,出现不可避免的误读、篡改和挪用。鲁迅和左翼文人与周作人、林语堂在关于小品散文文体性质的认知上有较大的差异。法国随笔家蒙田创立的“Essai”,曾在英国的流布中发生重大的变异,即英国16、17世纪盛

① 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174页。

② 转引自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③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179页。

④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94—295页。

行的从“细小处着笔”的“Essay”并不代表蒙田原来“Essai”的整个精神面貌。蒙田说：“我探询，我无知。”他是一位怀疑论者，对于什么问题都有质问的勇气。所以，史密斯称赞他“哲学的精髓是在于一种愤世嫉俗的常识”^①。其实，即便是英国随笔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闲适”面孔。与兰姆齐名的赫兹列特，他撰写的随笔用他的话说是“用画家的笔写哲学家的思想”^②，其文章有爱用排比、气势磅礴的特点。由此可知，随笔本身的性质并不只有闲适散淡一路。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应该在为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蹂躏，实现民族独立，重铸民族灵魂中充当积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及其左翼作家把小品文定位在“匕首”和“投枪”，其现实价值就凸现出来。也许，只有将鲁迅及其左翼作家对“小品”的定位，与周作人、林语堂对“小品”的理解，合并统观，才有可能全面而通透地认识和把握西方“Essay”的精神特质及其艺术旨趣。因此，朱光潜称，要给西方的“Essay”一个“正名”，指出这是“试笔”之意，并且在创作内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从来就是不受拘束的，很自由、很宽广。朱光潜说：“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抒写情趣，也有时是叙述故事。”这个诠释是合乎西方现代随笔小品史的实际，西方自法国蒙田创立现代随笔以来，随笔小品体裁是极其丰富多样的，“这其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近于哲理散文和杂文，有记叙回忆为主的，近于记叙散文，有抒情述怀为主的，近于抒情散文，有以状物描写为主的，近于描写散文，也有兼容议论、记叙、抒情、描写于一炉的，有着兼容并包的性质”^③。朱光潜及时指出当时文坛出现对“Essay”误读的现象，澄清了人们对“小品文”存在的“偏窄”理解，这为现代散文多方面的自由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① Alexander Smith (亚历山大·史密斯):《小品文作法论》(下),林疑今译,《人间世》第4期,1934年5月20日。

② 赫兹列特:《论舆论之源》,转引自《赫兹列特散文精选·序言》,潘文国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③ 姚春树:《东西方几位美学家散文理论述评》,《中外杂文散文综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4页。

第三,从“归化”的翻译策略看,着重探讨国外与国内不同语境下,构成中国现代散文“现代性”转型的关键要素,如“社会批评”、“文明批评”、“自我人格”、“趣味”、“闲笔”、“幽默”等。这些关键性艺术审美要素的解读,是研究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品格的特质及其生成的缘由。在这些关键性要素中,有些纯属于“舶来品”,但一旦通过中国现代知识者之手,它们就化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现代散文独特的精神内涵和美学风格。譬如,“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原本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学界创造的词组。但经过鲁迅一再推崇和标举,成为中国现代学界同仁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社会批判的一种重要指涉,其出现频率之高,使用范围之广,充分说明现代知识者毫无芥蒂,展现出“拿来主义”的汉唐气魄。“闲笔”一词,被视为西方“Essay”“最高的写作技巧”。当西方“Essay”在“五四”时期译介进来后,现代知识者马上被它的“闲笔”艺术所征服。朱自清遂将小品散文推荐给那些“懒惰”和“欲速”的作者,认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并且对小品散文的审美特性作了深刻的揭示:“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①林语堂为了让国人认识散文“闲笔”艺术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人们应“另眼搜集”,“在提倡小品文笔调,不应专谈西洋散文,也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虽然挨骂,亦不足介意”。他借助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引导,将现代散文的源头追溯至晚明的小品。如他举屠隆的《冥寥子游》为例,称这类文章与西方斯梯尔相同,“叙事夹入闲情,说理不妨抒怀,使悲涕与笑声并作,忧愤共幽逸和鸣”。^②因而,林语堂对于“闲笔”艺术的理解,多一层中国化了的“趣味”和“情调”的元素。“幽默”这一词语,来自林语堂对西文“humor”翻译。鲁迅翻译鹤见祐辅的《说幽默》时,曾作《译者识》表示:“将 humor 这字,音译为‘幽默’,是语堂开首的。因为那两字似乎含有意义,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所以我不大赞成,一

①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第7卷第20期,1928年11月25日。

② 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人间世》第22期,1935年2月20日。

向没有沿用。但想了几回，终于也想不出别的什么适当的字来，便还是用现成的完事。”^①在此之前，鲁迅翻译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的“Essay”理论，曾在英文“humor”后面用括号加注“滑稽”一词。显然将“humor”翻译成“滑稽”也只是一种权宜的做法。但是后来学术界也就慢慢地接受了林语堂创造的这个中文译词。在现代中国，鲁迅虽然并不是完全否定幽默，他曾说：“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但另一方面，鲁迅是一位比较倾向持中国无幽默论者。鲁迅说：“中国没有幽默作家，大抵是讽刺作家”，“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似乎没有。多是一些拙劣鄙野之类的东西”。^②尤其是“‘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③因此，鲁迅认为即便是幽默，也难免走样。鲁迅的这番话，我以为，是很值得人们的深思和警醒。林语堂引进英国国民性格中“幽默感”，使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散文作品平添一份幽默成分，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贡献。但是，如果引进幽默的目的，仅仅在于为幽默而幽默，让人笑笑而已，那就等于做了一件近乎无聊的事。朱光潜也认为：“极上品的幽默和最‘高度的严肃’往往携手并行。”^④使幽默含有“建设”的文化内涵，并与“高度的严肃”携手，这对提升幽默的艺术品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作用。

第四，本课题的“散文”研究，还关注散文大家族内部之间的“串门”现象。散文诗、抒情小品、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科学小品等，它们文类之间并非壁垒森严、互不关联，而是互竞互补，滋长繁盛，共同演绎着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群星璀璨的夜空。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研究并

① 鲁迅：《〈说幽默〉译者附记》，《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27年1月10日。

② 鲁迅致增田涉信，1932年5月13日，《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5页。

③ 何家干（鲁迅）：《从讽刺到幽默》，《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7日。

④ 朱光潜：《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徐先生》，《天地人》创刊号，1936年3月1日。后收入《孟实文钞》，改题名为《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辑者徐先生》，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4月。

非对散文大家族中的所有文类都进行探讨,而是在中西文化背景下,侧重于从“译介”视角,关注和研究中国知识者对某些文类的输入、移植和创化,进而清理出其话语的生成机制和艺术特点。

(一) 随笔。本课题将随笔概念放在中西随笔史的坐标上予以梳理与界定,通过随笔与笔记、小品文、杂文相互比较,概括出随笔本身的固有特性,否定学界普遍以“软”、“硬”标准来区分随笔与杂文的文类成规。从艺术的表现功能来看,只有随笔中的议论性“随笔”才能同狭义概念的“杂文”(即指以议论为特征的杂文,而非广义的“杂体文”)画上等号。本课题尤其侧重关注现代随笔鼻祖蒙田以来,包括培根、艾迪生、斯威夫德、兰姆、尼采、叔本华、罗素、本森、伍尔芙、萧伯纳、爱默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德富苏峰、高山樗牛、斋藤绿雨、长谷川如是闲、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夏目漱石、永井荷风、户川秋骨等人对现代随笔理论的创造性论述,以此为研究基点,旨在探讨和揭示中国现代随笔的美学特征。

(二) 散文诗。在现代中国,“散文诗”是外来的文类概念。它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传入中国时正值“五四”时期,当时现代知识者一方面从西方译介大量散文诗,另一方面也从事散文诗的创作,使中国散文诗迅速完成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可以说,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也是“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的产物。散文诗是应和着近现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心境变幻莫测,感情意绪微妙复杂和日趋散文化等特征而发展起来的。从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王尔德、尼采、屠格涅夫、纪德、泰戈尔、纪伯伦、希梅内斯、里尔克等散文诗作品里,人们解读出现代人的感悟、寓言的意味、世态的剖析、内心的独白、幻想的驰骋、梦境的奇异、印象的描摹等等,无不体会到这些散文诗大家对象征主义手法的领悟与妙用。

(三)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知识者对“报告文学”名称的认识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与大多数现代知识者的思想“左转”,尤其是30年

代初左翼作家联盟的出现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探析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如何选择、借鉴和转化国外报告文学理论资源，成为人们掌握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理论走向、审美倾向、艺术风格的关键之点。在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影响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试图从理论上论证报告文学的意识形态归属问题，阐明将这种新兴的文体交给工农自己，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部分，成为工农大众建设自己文学的体现。同时，与反映和表现工农兵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在阶级社会里报告文学可以作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提出申诉、抗辩和揭露的一种新兴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文体。总之，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一旦移植到正处于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的中国大地上，就赢得中国左翼知识者的青睐，从而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四）科学小品。20世纪30年代“科学小品”的崛起，是在“左联”倡导“大众语运动”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文体，这就意味着“科学小品”走向“大众化”之路，不仅是出于本身文体特点的自发要求，而且有来自左翼意识形态的规训与制约。“科学”与“小品文”的“联姻”，之所以能够产生一种新颖、独特的文体，关键在于“联姻”过程中，科普作家要恰当地处理好“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使之成为“以科学为骨肉而使其具有文学的形态的一种文章”。首先，在题材选择上要注意从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科学知识入手；其次，处理好语言的解说性与诗意美；再者，处理好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总之，科普作家对于大自然奥秘的探求与解读，其文字背后常常投射着一个民族过去的文化背景。科普作家笔下征引与采集与事物相关联的“往昔的文献或典故”，不仅能体现文辞之美，更重要的是由此灌注于事物其间的一种独有诗的情调与趣味。而这种诗的情调与趣味又是与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相关，是艺术的酵素，足以温暖润泽民众的心情。

（五）传记。中国拥有悠久的史传散文传统，传记作品彪炳于世界文化史林。然而，新文化的主要倡导者胡适却提出：“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